

第二届黄梅禅宗文化高峰论坛论文集

# 生活禅研究 2 下



主编 黄夏年

中州古籍出版社

第二届黄梅禅宗文化高峰论坛论文集

# 生活禅研究 2 下

主编 黄夏年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活禅研究. 2/黄夏年主编.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2. 4

(第二届黄梅禅宗文化高峰论坛论文集)

ISBN 978 - 7 - 5348 - 3824 - 8

I. ①生… II. ①黄… III. ①禅宗 - 中国 - 文集  
IV. ①B946. 5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5136 号

---

**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发行单位:**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安阳泰亨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890mm × 1240mm A5 **印张:**23. 125

**字数:**580 千字

**版次:**2012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定价:**54. 00 元(上、下册)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 禅文化与社会



# 中国佛教优良传统之一： 把寺院建设成文化活动中心

孙昌武

中国佛教本来具有浓厚的文化品格，在中国发达的文化环境下发挥文化上的优势是中国佛教的特色，是它得以长时期生存、发展、繁荣的重要条件。

中国佛教史上成规模的寺院群落建设始于两晋，此后历朝得到统治阶级支持，又有僧、俗信众的努力，寺院建设规模扩大，内容也得以丰富。中国寺院是弘传佛法的基地，是寺院经济实体，是僧团活动的据点，是僧尼居留的场所。还有一个方面十分重要，即寺院注重文化建设，积极开展文化活动，成为传播佛教文化的中心，往往又是地方文化活动的中心。法国汉学家谢和耐曾就佛教最为兴盛的隋唐时期的情况指出：

佛教在隋唐时代是中国文化圈中的社会文明和政治制度所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那里的寺院同时是世俗和宗教的中

心、中国文化和佛教文化的中心。<sup>①</sup>

在古代，城乡缺乏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场所，寺院的这种文化建设功能无论对于佛教自身的发展，还是对于一般文化的发展，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积极的作用。而这两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的。

今天振兴佛教，发挥佛教积极的社会作用，总结历史经验，寺院文化建设、文化活动层面值得特别予以重视。特别是在今天提高全民素质成为迫切需要的形势下，发挥佛教在这方面的优良传统，是应当引起重视的任务。

## 二

中国佛教寺院担负着研究和传播学术的功能，而中国佛教学术的成就乃是中国学术的重要构成部分，与世俗学术的发展密切相关。

在古代社会里，学术掌握在统治阶层手里。学术机构基本是两部分：一部分是朝廷和官府设置的，另一部分是民间的。国学和州、县学是朝廷、官府的教育系统。私家讲学则自春秋战国时期已形成传统。佛教寺院（还有道观）的出现，特别是那些大型寺院更成为新型的另类学术机构。它们的许多功能是朝廷、官府和民间讲学不能承担的，无论是治学内容还是治学方法、学风又都具有特点和专长。

梁慧皎所确立的撰写僧传体例大体为后代所遵行。几部重要僧传分科占第一、二位的都是“译经”和“义解”，而且在全书里都占很大比重。这反映在它们所记述的时期，中、外著名僧人

---

<sup>①</sup> [法] 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社会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4页。

主要活跃在这两个领域，中国佛教的重要成就也在这两个领域。佛教经典以理论内涵丰富、深刻，逻辑细密、严整见长。许多作品同时是高水平的思想、学术著作。“定、慧双修”本是中国佛教的传统。佛教教学与研究在中国佛教里一直备受重视。虽然历代都有专注禅修、隐遁山林或以遗身、兴福来弘法的僧人，但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下，高水准的学僧的活动更得到朝野推重，他们在社会上也有更广大的活动空间。这些人往往也成为一代佛教界的核心人物。他们广开门庭，授徒讲学，所在寺院俨然成为僧俗集中的学府。值得注意的是，寺院里所进行的学术活动内容十分广泛，并不限于佛学。有些是佛学外围科目，广义上也算是佛教学术的一部分。例如佛教史学、目录学（经录）、语言学（声韵、音义、悉昙、字书等）、佛教类书编纂，等等。更有些是纯粹的所谓“俗学”。如慧远所在的庐山乃是一代佛学重镇，他本人博综六经，尤善《老》、《庄》，“讲《丧服经》，雷次宗、宗炳等，并执卷承旨”<sup>①</sup>；而“周续之与雷次宗同受慧远法师《诗》义”<sup>②</sup>。庐山遂同时成为儒学教学中心。僧祐专精于文史著述，所著诸书有关佛教文史的学术价值十分宝贵，他对于外典文纪也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唐代密宗善无畏弟子一行是卓越的天文学家，他在天文学方面的造诣也是参访各地寺院养成的。据《宋高僧传》，他曾到天台山国清寺从一大德学算，“尽授其决”<sup>③</sup>，可见当时寺院里天算之学的水平。出于塔寺建筑的需要，僧人中对于建筑和工艺有研究的人甚多。例如僧祐、善导、善无畏等既是佛学宗师，又是卓越的建筑家和工艺家，他们在寺院建筑、工艺等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

① 梁·释慧皎著，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六《晋庐山慧远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21页。

② 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卷五《毛诗音义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3页。

③ 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卷五《唐中岳嵩阳寺一行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92页。

佛教具有一定的物质和人力条件从事教学与研究，取得众多学术成就，丰富和充实了整个思想学术。由于寺院具有“方外”地位，较少受到政治权势与世俗传统的约束，思想比较开阔，学风比较自由，提供了世俗社会所不具备的学术环境，有可能担负起更广泛、更丰富的学术功能，作为世俗学术的重要补充，对于推动整个学术发展更能够起到特殊作用。

目前中国寺院已相当普遍地重视学术活动。许多大型寺院建立起相关教学、研究机构，举办各种学术会议，出版学术论著和刊物，等等，已经取得一些成绩与经验。如何有效地利用有限资源来开展这方面活动，发挥寺院在学术上的优势，是寺院面临的一大课题。

### 三

中国寺院乃是民众一般文化活动的场所、地方文艺活动中心，在民众文化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中国佛教传播早期已注重利用文艺形式，从经典的转读、唱导发展出俗讲、转变（变文），在弘扬佛法的同时，又起到娱乐群众的作用。

寺院作为群众聚集之地，又常常成为群众聚会、游乐场所。大型寺院法会往往表演舞乐、杂技以及后来的百戏。如北齐僧人法上，朝歌人，“六岁随叔寺中观戏”<sup>①</sup>。隋薛道衡有《和徐给事善心戏场转韵诗》，描写洛阳善心寺新年期间演出“百戏”情形。北宋人钱易记述唐时情形：“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龙，其次荐福、永寿。”<sup>②</sup>当时一所寺院里大小戏场不只一处。有的时候朝廷整顿“风俗”，禁止寺院这类游艺活动，但实际不仅不可

---

① 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卷八《齐大统合水寺释法上传》，《大正藏》第52册，第485页上。

② 宋·钱易撰，黄寿成点校：《南部新书》戊卷，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50页。



能禁绝，朝廷往往参与、组织这类活动。

宋代城市经济发展，寺院作为公众活动的场所，往往又成为商旅云集，商贸、娱乐繁会之处。例如北宋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市）的大相国寺，周围百货杂陈，是繁华的市场。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寺内有智海、惠林、宝梵、河沙、东西塔院，乃出角院舍，各有住持僧官，每遇斋会，凡饮食茶果、动使、器皿，虽三五百分，莫不咄嗟而办”<sup>①</sup>，是饮宴场所；其中包括“殿庭贡献乐部”，畜养乐工，曾巩有《相国寺维摩院听琴序》，说“治平三年夏，得洪君于京师，始合同舍之士，听其琴于相国寺之维摩院”<sup>②</sup>，这是在大相国寺维摩院举行的听琴雅集。

宋代以后，寺院主持的大型文艺活动渐趋沉寂。由于市民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城乡出现新的娱乐形式，戏剧、曲艺等民间文艺兴盛。在新形势下，寺院又给这些民间艺术活动提供了场地。在各地城乡举行“进香”、庙会等佛事活动，各种戏曲、曲艺等文艺表演麇集，成为群众性游乐活动的大好时机。在城乡大多数地方，作为地方艺术表演中心的戏台建筑在寺庙对面或附近。这一时期佛教盛行超度亡灵、度脱众生的水陆法会之类纯宗教仪式已经较少文化内涵可言，而围绕寺院的这些游艺活动（还有经贸活动）一直显示着活泼生机。直到晚近，中国城乡各地兴盛的庙会，仍然发挥着作为民众游乐场所的功能。这也是延续了佛教寺院与民众游艺生活密切关联的久远传统。

建国以来，寺院的文艺活动基本沉寂。但在同是信仰汉传佛教的日本，同样的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实际上，多种多样的寺庙文艺活动往往具有民俗的、教化的多方面意义，又可以作为活跃社会生活的补充。寺院的或围绕寺院的文艺活动是否能够恢复、如何恢复是值得探讨的课题。

---

① 宋·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三，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上册第288页。

② 《元丰类稿》卷十三。

## 四

中国佛教在建筑、雕塑、壁画、碑刻等各艺术领域作出了极其巨大、杰出的贡献。寺院作为这些艺术成果的集中地，从一定意义说，也是广大群众可以享受的、特殊的公共文化设施。在古代社会条件下，一般民众接受艺术教育、享受艺术成果的机会很少，而寺院是面向大众的，在这方面还没有其他场所能够比得上佛教寺院所起的作用（道观也起同样的作用，但无论是内容，还是水准，都远不及佛教寺院）。

佛教寺院建筑，从其规划、布局到山门、厅堂、佛塔等的建造，乃是古代建筑艺术成果，许多都达到高度艺术水平。在古代建筑中，宫室、陵墓、民居之外，寺观是个重要类型。佛教寺院建筑形成一系列特点，往往体现一代建筑艺术的最高水准。如今存留的寺院建筑明、清以前的很少，当然弥足珍贵；大部分明、清时期的建筑，特别是大型寺院群落，仍具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这是面向民众的建筑艺术遗产。

佛教在中国被称为“象教”，特别注重发挥形象教化作用，这也成为它的一大特色。各种形式的佛教造像，包括寺院的，石窟的，社邑、家庭供养的，除了信仰意义之外，更具有独立的艺术价值。晋宋以来佛教绘画艺术兴盛起来，同样取得杰出成就。除了绘制在绢帛、纸等材料上的，石窟、寺院壁画也成为重要的艺术样式。到唐代，寺院壁画创作更进入黄金时代，两京和地方各大寺的壁画多出自著名画家如展子虔、尉迟乙僧、吴道子、周昉等人之手。就是说，在寺院里，可以看到第一流艺术家的杰作。

一些寺院和石窟的碑刻是书法作品，其中同样有许多是大书法家的杰作。大型寺院碑刻集中，可看做书法博物馆。例如今天传世的、被当做学术范本的碑版很多是佛教的，许多都是一代最

优秀的书法家的最精彩的经典作品，如褚遂良《伊阙佛龕碑》、《雁塔圣教序》，薛稷《信行禅师碑》，李邕《岳麓寺碑》，颜真卿《长安千福寺多宝塔碑》，柳公权《安国寺玄秘塔碑》等。前面提到的宋代开封大相国寺“大殿两廊，皆国朝名公笔迹”<sup>①</sup>，它们与壁画交相辉映，成为寺院里珍贵的艺术精品。唐、宋以来又盛行在寺院题壁的风习。例如白居易给元稹写信，就说到“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又题仆诗者”<sup>②</sup>。许多著名人物在寺院墙壁上留下了墨宝。群众在这里欣赏优秀的书法艺术精品，对群众性的书法教育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至于历代僧俗大众写经，成为群众锻炼书艺的良好机会，对于提高全社会的书法水平也起了重大作用。

在工艺方面，从晋宋到隋唐佛教大发展时期，有大批最卓越的艺术家和技艺精良的工匠参与寺院建设和佛像雕造。寺院建筑从设计、建造到装修、布置等，造像从形象设计、金属熔铸到雕造，竹木等材料雕刻、装饰，颜料配制与使用等，都需要相当精湛的工艺。特别是在古代，作为神圣事业的佛教工程，在工艺方面必定精益求精。在长期创造过程中，不断积累起大量成功经验，艺术水平也不断得以提高。这有今存许多遗物可以证明。佛教在工艺方面的创造与成就在许多方面是世俗工艺不可企及的，有效地带动了后者的发展与提高。

近代许多佛教寺院遭受到严重破坏，但存留的有价值的艺术成果仍然不少，另有些可以加以恢复。在这方面，东邻日本的经验同样可以借鉴：他们的很多寺院珍惜地保留艺术成果，采取措施向群众介绍，出版普及读物，举办各种展览，等等。

---

① 《东京梦华录笺注》卷三，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上册第289页。

② 《与元九书》，《白居易集笺校》卷四十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5册第2793页。

## 五

古代许多寺院在环境建设、环境保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俗谚有所谓“天下名山僧占多”。寺院广占田园、山林，在国计民生方面造成许多问题，可是从实际情况看，寺院所在的山林、郊野又往往是自然生态保护得很好的地方。特别是寺院附近，一般说来拓荒垦殖较少，植被得到比较充分的维护。许多僧众都热心植树造林，这与实践“护生”观念有直接关系。例如天台山，自东晋以来，经过佛、道二教的经营，成为“禽兽草木长生之福地”<sup>①</sup>。直到如今“四大名山”仍是环境保护较好的地方。

另一方面，城乡寺院作为佛国净土“清净地”，对于培养人们对待大自然的健全态度，对于保护自然环境，往往起着示范作用。特别是都会里的多数寺院大多林木繁茂，花树葱茏，成为民众的休憩场所、都市中的公共绿地。古代城市建筑以宫殿、官署为中心，以民居为主体，没有规划专门的公共活动场所；空闲地区则是荒地，没有营造公共绿地的观念。例如唐代长安的一些寺院更以花树繁盛有名，成为民众观赏游乐的好去处。白居易《秦中吟》里有《买花》一篇，是讽刺全城如痴如狂地观赏牡丹热潮的，也从侧面反映了寺院培植花木的情形。直到今天，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处山林，寺院一般仍都是林木葱茏、生态环境较佳的地方，也是供人们观赏、享受自然美景的游览胜地。寺院风光培植了人们热爱自然的心理，诱使艺术家们用各种方式歌颂那里的自然美景，则间接培养了人们感受自然美的情趣和能力。

不过如今一些寺院成为旅游景点，自然环境欠缺保护，则是应当注意的问题。

---

<sup>①</sup> 唐·徐灵府：《天台山记》，《唐文拾遗》卷五十，《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1册，第1094页。

此外，古代寺院还发挥不少文化功能。如有“以僧寺停客”<sup>①</sup>的风俗。一些寺院规模宏大，房舍充裕，膳食方便，容纳客居更有条件；也有的寺院经营邸店以营利。唐、宋以来，赶考的举子、落第的书生往往寄居寺院。许多寺院成为僧俗之间、一般士大夫的交际场所，这也提高了寺院的文化品位。避难官员、落魄文人以至侠客、逃犯各色人等在寺院隐居。如此等等，寺院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形成独特的文化氛围。

总之，古代寺院的文化建设、文化活动留下许多珍贵的经验，作为佛教的遗产，值得加以总结、研究、继承、借鉴。今天的佛教应当在文化领域多做一份贡献。

（孙昌武，南开大学）

---

<sup>①</sup> 唐·李延寿：《北史》卷三十三《李灵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212页。

# 禅宗祖庭文化建设之思考

陈金凤

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 30 多年间，随着党和政府的宗教政策得到正确的贯彻与落实，以一批“禅宗祖庭”（后一般简称“祖庭”）为代表的佛教名刹古寺重整山门，再塑金身，顿现勃勃生机与无尽魅力，禅宗走向全面复兴已是活生生的事实。毋庸置疑，不少禅宗寺院的硬件建设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然而，相较之下，它们的软件建设——文化建设虽日渐受到重视，也取得了不小成果，但无疑滞后于时代发展的要求，各种困惑已成为禅宗向前进步的羁绊。与此同时，各祖庭往往在当地的经济建设（主要是以旅游业形式展开）中居于较为重要的地位，甚至是当地经济建设的支撑点，也对祖庭的维持与发展带来了不少新的机遇和挑战。因此，探索、深化祖庭的文化建设以适应禅宗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已成为当今禅宗界、政府、社会重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笔者不是禅门中人，也不是公门中人，没有也不可能站在禅门、政府的角度提出真正契合当代禅宗建设的建议，本文只是以俗人的头脑用随笔的形式做出的一些个人浅陋思考。

产生于古印度的佛教在中国得以发展兴盛，产生广泛而深远

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禅宗。中国佛教的特质在禅，禅宗是最中国化且最具影响力的佛教宗派。由于中国禅宗奉行“祖师禅”及禅宗发展地方化的特点，不仅有初祖达摩、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惠能等祖师祖庭；有诸如惠能南禅宗门下“五家七宗”之类分家分派祖庭；还有某些禅师虽然没有开宗立派，却因自创山头或中兴禅宗而形成的祖庭。大大小小的祖庭可谓遍布天下，历史上禅宗祖庭一定意义上奠定了中国禅宗发展的走向与格局，当今的禅宗发展在一定意义上仍是以祖庭为中心、为组织网络的发展。这些祖庭在中国禅宗史上居于重要的地位，也成为当代全国性或地区性重要的习禅修法、弘法扬佛中心。禅宗祖庭及其文化具有国际性、唯一性、神圣性等特点，对门下僧侣、广大信众及相关的研究者，都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以黄梅禅为例，因四祖、五祖祖庭之所在，自唐代以来，就有“蕲黄禅宗甲天下”、“佛教大事问黄梅”之说，至今仍是天下禅徒倾心向往之圣地。

禅宗要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祖庭文化发扬光大。目前，禅宗祖庭文化的建设还没有应有地重视，突出表现在：祖庭文化建设的思路不明确、不集中；对祖庭文化的先进思想、核心内涵还没有很好的挖掘、整理、研究；对祖庭文化重批判而轻建设，甚至有批判而无建设。特别是，中国的禅宗祖庭本是群体，是集团，但现在的祖庭文化建设都是各祖庭之中的个体行为，缺少共同建设的理念。热闹繁华的背后，是禅宗发展与进步的冷落。这导致了当代祖庭文化与其祖庭的地位不相称，根本无法满足信众的需求，难以推动禅宗事业的向前发展。

禅宗自身建设得好坏往往是决定禅宗兴衰存亡的根本内因。早在1993年，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在《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一文中就指出：“根据当前的形势和我国佛教的实际情况，着眼于佛教事业建设与发展的未来，各级佛教协会和全国佛教界都必须把注意力和工作重点转移到加强佛教自身建设、提高

四众素质上来。加强佛教自身建设，就是加强信仰建设、道风建设、教制建设、人才建设、组织建设。”十多年后的今天，包括禅宗在内的佛教界在各方面的建设都取得不少的成就，但赵朴老所提出的加强佛教自身建设的问题，至今仍是禅宗界的基本问题。因此，当今建设禅宗祖庭文化不仅是落实“文化建寺”的重要措施，而且对禅宗自身建设也有相当大的启迪意义与促进作用。

禅宗之所以为禅宗，就在于有禅宗精神；祖庭之所以为祖庭，就在于祖庭有独特的禅宗文化精神。当代禅宗祖庭文化建设以何为重？在于回归、弘扬祖庭文化精神。祖庭的文化精神内容极其丰富，涵盖广泛而深刻。其中，最主要的当是：（1）艰苦创业的精神。各祖庭创始人、历代高僧大德之所以能开宗立派、弘扬祖庭宗风，在于他们信仰坚定，以弘扬佛法为己任，不畏艰险，不惧困难，一往无前地进行创业、守成。达摩始祖于少室山面壁九年以悟禅理，奠定中国禅宗之基；四祖道信、五祖弘忍筚路蓝缕，以坚定的宗教信仰长期忍耐并藐视孤独，在当时偏僻落后的黄梅之地拓开中国禅宗的一片天地；六祖惠能在岭南刻苦修法数十年，百折不挠，创立南禅宗；马祖道一辗转四川、湖南、福建、江西等，披荆斩棘开设丛林，创建洪州宗；虚云长老在云居山以一身兼嗣五宗，历尽九磨十难，大力振兴禅宗祖庭。诸如此类的事例，在禅宗历史上不胜枚举。（2）与时俱进的改革创新精神。宗教历史表明，“宗教历来是适应社会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其教义、组织、仪式等，才得以继续存在并发挥其社会作用，不适应的就被淘汰了”<sup>①</sup>。禅宗之所以成为最中国化和影响最大的佛教宗派，祖庭之所以能维持长久、生机勃勃、生命力顽强，在于祖庭历代高僧大德能基于国情、地情，与时俱进地不断开拓创新。从如来禅到祖师禅，从东山禅到南宗禅，从黄檗宗到临济禅

---

① 罗竹风主编：《宗教学概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07页。



……无一不体现出禅宗改革创新的巨大精神。禅宗的历史，一定意义上就是不断改革创新的历史。禅宗的改革创新，关键在于禅宗大师们可贵的不唯上、不唯师，唯发展兴盛禅宗是从，契理契机地进行禅宗活动。以黄檗希运为例，希运继承和弘扬了禅宗诸祖的禅学思想和宗风，一生真参实证，得马祖道一的“大机大用”，但他却不以嗣马祖为最终目标。《古尊宿语录》卷二载，希运曾告诫弟子说：“若嗣马祖，已后丧我儿孙。”并进一步发挥说：“不道无禅，只道无师。”这些言论正体现了禅宗最为可贵的创新精神、敢为天下先的精神。黄梅禅是中古禅宗改革创新的典范。众所周知，达摩以来，禅修者大多是“行无踪迹、动无彰记”，并没有固定的传教场所，以致“法匠潜运，学徒默修”，道信“择地开居，营宇立象”，从而使禅宗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杜朏《传法宝纪·道信传》载，道信提倡“作坐并行”，每劝门人曰：“努力勤坐，坐为根本，能作三五年，得一口食塞饥疮，即闭门坐，莫读经，莫共人语。”“能作三五年”的“作”或名作务、作役，泛指一切生产劳动。道信号召门人一边坐禅一边从事作务，以便“得一口食塞饥疮”。他当时所集聚的500余徒众，便依靠自身的劳动，主要是垦荒柴耕，解决吃饭问题的。及至弟子弘忍“役力以申供养，法侣资其足正”<sup>①</sup>，继承了道信作坐并重的禅风。由此，他们正式把劳动吃饭当做禅门的大事，列进禅行之中，改头陀苦修为自食其力、自耕自给的农禅并重的丛林集体生活，这在整个佛教史上，是具有真正革命意义的创举，后世禅宗“马祖建道场，百丈立清规”的禅宗丛林即导源于此。<sup>②</sup>

(3) 立身垂范的精神。祖庭的宗师，无一不是品德高尚，学问渊博，充满人格魅力。他们坚信禅是佛教命脉，是佛教的根本，是禅宗僧侣法身慧命之所在，视修法、弘法为自己毕生的事业和生

① 唐·净觉：《楞伽师资记》，《大正藏》第58册，第1289页中。

② 法缘：《道信、弘忍和东山法门》，载《禅文化》（第一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年。